

寧波文化研究



论文集
宁波文化研究会
(2002年卷)

宁波文化研究论文集

(2002 年卷)

宁波文化研究会

目 录

提高文化自觉 推进先进文化.....	金 涛(1)
实学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	方祖猷(9)
黄宗羲文学思想新探	李燃青(25)
论刘宗周誠意学说中的誠信原则	张瑞涛 方同义(34)
古代明州与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	杨古城 曹厚德(45)
一代国史仗布衣	
——黄宗羲 万斯同与《明史》编纂	诸焕灿(55)
从宁波庆安会馆看清中叶妈祖文化地域化的演进	
.....	黄浙苏(66)
胸中块垒 笔底波澜	
——李邺嗣及其诗文.....	戴松岳(73)
何必为古人重迁户口	诸焕灿(85)
月湖的休闲文化	徐晓虹 唐 亭(97)
写在《天一阁集》影印出版之前	袁 慧(102)
试论东钱湖南宋墓葬和堪舆术	杨古城 曹厚德(113)

论宁波帮精神	孙善根(118)
神奇的鄞南	
——浅述红帮源流及其启示	陈万丰(128)
近代浙东棉纺业的双璧	
——通久源纱厂与和丰纱厂	陈梅龙(135)
论罗蒙的营销创新与CI设计	朱惠民(141)
东情西韵的设计佳作	朱惠民(153)
宁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更新	杨古城 曹厚德(159)
望祭与秦始皇巡游会稽之行踪	
——兼辨秦始皇到过宁波沿海	祝求是(164)
张苍水海上春秋编年辑笺(1645-1664)	祝求是(189)
对南宋史嵩之联蒙古灭金的新评价	杨成鉴(222)
后记	金 涛(228)
附：宁波文化研究会会员名单 (229)	

提高文化自觉，推进先进文化

金 涛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大力提高全党全民的文化自觉意识，迫在眉睫。文化自觉意识，来自对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清醒认识；文化自觉意识，来自对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清楚认识；文化自觉意识，来自对先进文化方向性的明确认识到。文化自觉，最根本的是把思想认识化为自觉行动，做到明 确思想和自觉行动的统一。

关键词：文化自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三个代表”放在我们党能否“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的高度来认识。在“三个代表”思想里，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列入其中，把文化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说明我们党对文化本质和先进文化作用的认识已经步入了一个新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

对于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而把代表先进文化也提高到立党立国之本的重要地位，并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能够很好理解的。文化自觉时代已经到来，而先觉者为数还不很多。这种状况说明，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唤醒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

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大力提高全党全民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真正做到重视文化事业，高扬先进文化，肩负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用。

一、文化自觉，贵在认识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自觉意识，来自对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清醒认识。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在改造人类，提升人类。在当今世界里，文化比任何时候地位更加显赫，作用更加重要。世界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趋势，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文化的支撑，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作用越来越强劲，科、教、文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和巨大驱动力，因而文化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21世纪的经济赛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种种迹象表明，继资源、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之后，文化力将主导全球竞争，并最终决定民族、国家、地区乃至一个企业的命运。谁忽视文化力的提高，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败北。文化关系到中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前途和命运，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不能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他们需要知识，需要娱乐，需要消遣，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也讲究审美，讲究品位。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化。于是文化适应时势走出了狭小的领地，空前广泛地参与人的社会化过程，影响社会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文化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究竟用什么样的文化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关系到社会风气的优劣，关系到国家文明水准的高下，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战略议程。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就可以赢得引领社会文明的主动权。

我国当前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期，市

场经济的发育期。现代工业快速增长，商品交换日趋频繁，广告的参与，扩大了传播的影响力。伴随经济的繁荣，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两重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现代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如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文明危机、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等，在我国已经程度不同地开始有所表现。尚未规范的市场经济的自发盲目性所造成的种种负面效应，随处可见，触目惊心。这一切都需要有更高层次的人文价值导向和社会道德规范。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国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素养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成了事关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邓小平同志早已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我们的时代呼唤文化，我们的国家需要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放映，同时又对经济政治的发展产生反作用。文化的这种反作用在当今社会更为显著。文化可以塑造人的灵魂，也可以腐蚀人的灵魂。文化可以创造社会文明，推进社会文明，也可以阻碍社会文明毁于一旦。文化可以兴邦治国，文化也可以导致亡党亡国。可见对于文化决不能放任自流，它需要有引领的先进力量，需要有明确的前进方向。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就曾语重心长地指出：“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尔后，“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思想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对当代形势的深刻认识。

二、文化自觉、贵在认识文化的规律性。

文化自觉意识，来自对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清楚认识。

鲁迅称我国历史上魏晋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全集》第3卷第504页）。那个时代以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为代表，为文学的特性和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有了清楚的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门类进入了自觉发展的自由王国。可见文化的自觉，首先要洞察文化创造的特殊规律。文化创造，既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又要有人聪明才智发挥的自由天地。江泽民同志指出：“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先进文化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论“三个代表”》第159页）就是在对文化创造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基础上提出来的。当然，各种文化门类还有各自的特殊性。把握了它们的特殊性，才能深入堂奥，游刃有余，创造出各种文化精品来。

文化自觉，还要对文化发展的规律有清晰的认识。回顾我国古今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一般是在因革、兼容和斗争中前进、发展，走向繁荣昌盛的。

文化的建树总是有因有革，在继承和革新中不断创新、不断向前发展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今天创造与发展新文化的基石。新文化的创造不可能从零开始，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凭空构建，只有在前人积累的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在历史提供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借鉴是必不可少的。但文化创造又不可能循守旧，创新是文化创造的灵魂。创新就是对传统的突破。文化的发展就是不断革除制约社会发展的旧传统，开拓精神领域新生面的过程。江泽民同志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

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胜利旗帜下。”(《论“三个代表”》第60页)为我们指明了文化继承与创新的正确道路。

文化的发展虽有着内生的自我超越，而更为积极的动因则是外向的文化交流。中国文化正是在不断博采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走向雄浑壮大，增强自身的先进性。如果说秦代以来是我国本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期，那么从汉代起便进入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从此中华文化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从而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和活力，出现了汉、唐文化的兴盛局面。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消化改造，为我所用，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当然，在古今历史上，我国也有过闭关锁国导致落后被动乃至挨打的教训。事实雄辩地说明，只有放眼世界潮流，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获得新的发展，而不至于夜郎自大，固步自封。

人类对社会的观念反映，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往往有正误之别，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都有精神和糟粕。在对外开放形势下，各种思想文化如八面来风，进入我国大地。因此，我们面对的既有先进文化，也有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而且不论是先进文化，落后文化，还是腐朽文化，总是竭力施放自己的能量，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这就存在一个思想文化阵地究竟由谁来占领的问题。在各种文化相互争夺阵地的严肃斗争中，先进文化只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牢固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今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先进文化战胜腐朽文化、改造落后文化的历史。我们说要提高文化自觉，就是要认清自己的使命，提高代表先进文化的自觉性。我们党只有代表先进文化，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大众的精神向导，成为领导两个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党要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人民胜利前进，就要做好精神向导。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我们党只有代表先进文化，高扬先进文化，才能有效地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消除其负面影响，引导领人民大众走向光明的未来。在我国思想文化阵地上，共产党人应该旗帜鲜明，决不能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和平共处，平分秋色，更不能让违反科学、庸俗下流的东西任意扩散，污染空气。

三、文化自觉，贵在认清先进文化的方向性。

文化自觉，来自对先进文化方向性的明确认识。

文化的方向性，是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也是一种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特质。先进文化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体现自己时代的精神，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社会越发展，先进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导航作用和动力作用就表现得越明显。

先进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先进文化有其不同的内涵特质，也有其不同的前进方向。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先进文化又有其共同的特征：它总是时代的旗帜，社会的灵魂；谁能够拥有和掌握先进文化；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谁就拥有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明确代表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大众的（即是民主的），是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有机统一。在这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已经阐述的十分清楚。在革命战争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灯塔和舵手。

我国现阶段，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实际上已为我国当代先进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建党 80 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继承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进一步完整深刻地阐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容、重要作用和前进方向。

我国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是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所谓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促进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要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矢志不移，努力实践，也就把握了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我国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如果说社会主义方向是为中国文化定性的话，那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则是为中国文化求质，二者必须有机结合为一体，达到方向明确，品质优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即是对这种统一方向的准确概括。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是我国文化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力量。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现阶段的延伸与发展，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鲜明时代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是强调当今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是对新形势下先进文化内在的宏图大业，又与世界先进文明同步，具有前瞻性，能够将人类引向更高更新的阶段。先进的杰出的文化成果，既属于本国，又属于世界；既属于现代，又属于未来。我国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许多这样的文化杰作，今天我们同样有责任、有信心创造这样的文

化精品。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保持先进性，发挥先锋作用的一面旗帜。生产力的发展，全民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的进步，都需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明确繁荣先进文化的方针路线，才能高举旗帜引领广大中国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完成振兴民华的伟大历史使命。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除了有先进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指引之外，还应造就一大批具有雄厚创新实力、能够与时俱进的文化先锋。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不停地催促着文化前行。各种思想文化竞相扩展自己的影响，彼此消长，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只有奋力开拓创新，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丰富精美的精神食粮，增强思想文化产品的感召力，才能占领广大群众的心智，成为引领一代风尚的先进力量。如若不能把亿万人民紧紧地吸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代表先进文化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自觉是与“自发”相对而言的，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的一种活动。因此，文化自觉，最根本的是把思想认识化为自觉行动，做到明确思想和自觉行动的统一，把建设和推进先进文化真正作为立党立国的一件大事来抓，切实付诸实践，落到实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然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三大支柱之一，文化工作就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一项铸造“钢梁铁柱”的硬工程。我们要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宗旨下，一手抓先进生产力，一手抓先进文化，两手都要抓紧，两手都要过埂，自觉有力地推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

实学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

方祖猷

20世纪80年代前期，海外学者开展了中国经世思想的讨论，由“经世”涉及“实学”，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反响。80年代末，国内学者开展了两次明清实学思潮的讨论，以明清实学为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学之间的一个阶段，似乎已成为国内学者的基本认识。这一提法，突出了实学思潮的重要地位，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然而，它把晚明以个性解放为特点的人文主义思潮亦囊括进去，似属不妥。我认为，晚明既存在着实学思潮，也存在着人文主义思潮，这是两个性质不同，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思潮。

一、中国思想史上的“虚实之辩”

在中国思想史上，所谓“实”是与“虚”、“无”、“空”相对而言的。在春秋时期，表现为以很少讲性与天道而以“仁”和“礼”为主要内容的孔子社会政治伦理哲学，与讲天，讲无、玄、虚而以“道”为主要内容的老子哲学的差异。前者构成了儒家学派的社会本质——入世、经世；后者构成了老庄学派的社会本质——遁世、避世。前者的特征是“实”，后者的特征是“虚”。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无”为本的玄学和隋唐时期以“空”为本的佛学的流行，佛老之虚，一度在思想界占有主要地位。关于儒学与佛老特征的区别，后儒都分很清楚，并以自己的“实”而自豪。如朱熹说：“如释氏便只说空，老氏便只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①但是这一区别，到了宋代开始复杂化了，从中国认识史角度看，由于佛老精致的理性思辩大大超过了原

始儒学，特别是佛学的般若空宗和华严的“理事不二”，以高度的思辩，论证了世界的本体的“空”。为了对抗佛学咄咄逼人的声势，儒者不得不把原始儒学思辩化。他们采取的方法之一，是把儒家经典中具有思辩化的因素发掘出来，于是《中庸》和《大学》从《礼记》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典；方法之二是吸取佛老的理论成果，予以改造，构筑了自己的世界构成模式和本体论，援佛入儒，使孔子不谈的性与天道，成为儒者的议论中心，于是，新儒学出现了，这就是宋明理学。

这样一来，儒释虚实之辩就复杂化了，儒之实与佛老之虚，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不是倒退，而是历史的进步，大大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辩性。但是，理学只不过利用佛老的思辩性来为现实服务，他们把封建纲常抽象化为“理”，目的是使封建纲常更好地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就是说，它的“虚”是为“实”服务的，理学是通过虚实结合更好地体现了儒学的社会本质：入世和经世。所以理学的本质特征仍是“实”。

程朱理学自宋末以后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明初，朱元璋定八股取士，明成祖下令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为八股取士作准绳，从此理学僵化了，繁琐化了，成为士子猎取功名的工具，徒具形式，日益脱离实际，大大削弱了程朱理学的“实”，即其入世和经世精神，也就是说，它由“实”而“虚”了。

理学另一派，即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为纠正程朱理学的“虚”而崛起的，请看王阳明的自己的表白：“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藉藉，群起角立于天下……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

① 《朱子语类》卷九五。

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越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已。”^①他在这里所说的“训诂”、“记诵”之学，前者即指望程朱等传注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后者即指八股取士，士子对《大全》的记诵，他认为一世迷惑于这种空疏、支离、无用的“虚文”，已严重脱离行事之实。他在同书多次申述欲以行事之“实”来纠正谬妄的“虚”文的观点，如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天下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反映了王学是为了挽救明中叶严重的社会危机而产生的，于是他的“知行合一”论就应运而产生了，这是以“实”救“虚”。由此可见，不但程朱理学自称实学，即王学亦自称实学。

王阳明不同意以功利来救朱学之虚，上文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说的“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句，他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对此句有说明，他认为《六经》是“吾心之常道”，比如，富豪之家怕其产业为子孙遗忘，而把其产业记载于账簿上，“吾心之常道”就是产业，《六经》就是账簿，所以他说：“《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可是，“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傭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②这就是所谓“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王阳明的意思是，朱学之虚，是只求《六经》之形式，而失却其所载“吾心之常道”。他不同意以功利来救朱学之虚，而主张以“吾心之常道”，来救朱学之虚，于是他的“致良知”，“心即理”就应运而生了，他借助于禅宗的佛心说来构筑他的心学体系，这是以虚救虚；王学既以实救虚，又以虚救虚，在其传播过程中，以虚救虚这一方面取得了片面的发展，于是它自己亦立

①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② 《阳明全书》卷七。

即由实而虚了。这一学风的转变，顾宪成和高攀龙都认为以嘉靖朝为转折点，如顾氏说：“弘正以前，天下之尊朱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拘，于是激而为王子。正嘉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①高攀龙则指出：“自嘉靖以来，天下之学出于二：出于一，宗朱子也；出于二，王文成公之学行也。”他认为，出于二就害道了，“高之则虚无寂灭，卑之则功利词章”，并说：“当文成之身，学者则已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而文成亦悔之矣。至今乃益以虚见为实悟，任情为率性，易简之途误认，而义利之界渐夷。”^②

顾、高皆以为嘉靖以后，由于王学流行，学风由实变虚：从本体论上讲，“自释氏以空为宗，而儒者始恶言空矣，迹时之论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屡空，颜子也，奈何举而让诸释氏？’则又相充而好言空”^③；从认识论上讲，则高唱顿悟，然而，“顿悟二字，便是空宗入门”^④。针对王学之虚，东林学派提倡“实”学，高攀龙说：“学涉玄虚，士迷利禄二语，括尽世弊。天下无真事功者，由无真学术，学术果真步步踏着实地，朝市山林，皆有事在，不必得位也。”^⑤

关于宋明理学演变过程中这一虚实的变化，日本著名学者冈田武彦先生在《宋明实学及其流派》一文中也有中肯的分析，他认为“实”是与“虚”相对而言的，宋儒之学，以佛学为虚，而宋学则是实。至明代，王学兴起，又以程朱末流之学为虚，王学为实。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即在此虚实相对下展开的。

① 《经皋藏稿·日新书院记》卷十。

② 《高子遗书·王文成公年谱序》卷九上。

③ 《经皋藏稿·心学宗序》卷六。

④ 《小辩斋偶存》卷三。

⑤ 《高子遗书·答周二鲁》卷八上。

二、东林学派对王学之虚的批评

然则王学怎么由实变虚的呢？东林学派认为这是由于阳明学术本身错误造成的，这一错误为“末流”所发展，成为“玲珑虚幻之谈”，致使“遍天下皆禅学”。他们对阳明之学的非难有三：

非难一：反对阳明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

顾宪成说：“‘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此阳明先生语也……乃阳明此两言者，宪犹然疑之，未能了也……今天人之一心，浑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几何？惟圣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焉，或驳焉，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见其难也。”^①

顾宪成认为，阳明此言如为圣人设，自然没有问题，如为一般学者设，以己心为标准，得则是，不得则非，而不顾孔子的教导，那必然“自专自用，恁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②了。

非难二：反对阳明“心即理”说。顾宪成又说：“阳明尝言：‘心即理也’。宪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始可言‘心即理’，七十前尚不知何如也？……漫曰‘心即理也’，吾问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无星之秤，无寸之尺，其于轻重长短几何不颠倒而失措哉！”^③

这是非难一的深入。既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己心之是非为是非，自然要涉及“心即理”了。

非难三：反对“无善无恶”。“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阳明天泉证道四句教的第一句，后来王畿发展了这一思想，在晚明流行一时。顾宪成认为这四字“是最玄语，是最巧语，又是最险语”，他说：“谓人

^{①②③}《经皋藏稿·与李见罗先生书》卷二。